安徽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文化阐释

姓名：余红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武菁

20070401

摘 要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的对比中，更加暴露出封建社会的腐朽和落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先进的中国人或主张改良，或力倡革命，自觉担负起挽救“天下”的责任，其中大多数人把目光瞄准西方，期望能够寻求解救中国的良方。当时活跃于社会的各个政治派别在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并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同时，也意识到社会风俗在对人的塑造方面有着巨大的能量。无论是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还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再有鲁迅等人改造国民性都涉及到风俗习惯对人的影响。不管主要意图是救国还是救人，革除陋习，改良社会风气都显得尤为重要。古云：“事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①]反之，事变即政治的变革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政治变革之际，移风易俗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广泛要求。于是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纷纷要求革除陈规陋习，推行新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遂掀起了移风易俗思潮，以期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的社会风气。

移风易俗思潮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它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深远。它的出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其中服饰变迁是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变迁的直观表现。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饰等就是文化的外观，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②]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衣冠发饰等外在的东西赋有更为重要的寓意。因为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不识字，因此外在的装饰打扮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更能向他们传递某种信息，也较为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在此意义上，服饰的变迁潜在地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启蒙，同时也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服饰变迁表面上改变的是人们的外在服饰，实际上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民众文化心理的改变和自我调适。

这一时期服饰习俗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男子的剪辫、女子的放足，

[①][汉]刘向《说苑·杂言》

[②]高霞玲、成小明《略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政治文化意义》《南华大学学报》第6卷第5期

以及服装从中、西装混杂到中西结合的新式服装的出现。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服饰的追求上出现了求简、求新、融合变通的价值趋向。这种趋向既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是传统文化广博的包容性所致。该时期服饰之所以变迁，既有历史、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虽然总体上服饰变迁迅速，然而在变迁过程中也是不均衡的，呈现出地域上和社会阶层上的差异，变化中凸显出时代的特点和鲜明的民族个性。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服饰等级制度被打破，对服饰的追求也渐趋理性并体现出人文关怀。但服饰变迁并非全盘抛弃旧服饰及全盘接受新式服饰，而是有选择的接受，并合理的保留，如长衫、旗袍等。服饰在继承中有改革，有创新，但毕竟没有脱离传统的灵魂和韵味。然而服饰变迁的深层意义在于反映民众求变的价值趋向。传统的服饰习惯发生了改变，民众开始追求更高标准的审美情趣。服饰正朝着多元化、个性化方面发展，虽然这种变化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中，却也显出了时代发展的蓬勃生机。

时至今日，我们再反观清末民初时期的服饰变迁，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中国服饰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是民众躯体文化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示着社会风貌。今天丰富多彩的服饰也反映出服饰文化的繁荣，而在繁荣并提高民族服饰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形成新的服饰文化的思想资源和灵感来源。

关键词：移风易俗　　服饰变迁　　求变趋向

Abstract

I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ole society was in a desperate situation. Compared with advanced culture of western countries, feudal society become rotten to the core and declining. It w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untold miseries. In order to find a way out, many advanced people of China advocated western culture. When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west with science and the technology were introduc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hanging prevailing habits and customs. Out-moded conventions and bad customs were criticized fiercely, so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changing prevailing habits and customs came into being.

Especially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changed greatly. It changed not only people's apparels but also their ideas.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men's braids cut, freeing women from foot-binding and appearing clothes of new styles. The new idea and new way of life and behavior influenced the Chinese people deeply, so they wanted to depart from formula followed in the past. At last the changes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were to be simple, new and harmony. I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common people tended to seek changes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Though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changed greatly,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y and city,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and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Social estate system ended and new culture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came into being. The common people could be dressed up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s showed solicitude for human being. Bu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was not given up. New clothes full of distinctive national feature were popular with the common peopl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came to be diversified and it was also full of individuality. Though the new changes happened in big cities, they were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As we known,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changed i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race to its source, traditional culture had great effect on 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was so extensive that it could absorb advanced culture of other n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our fine tradition.

Until today, when we look back upon the changes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i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e can get enlightenment from them. The culture of Chinese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showed style and features of society, so we must learn and hand down fine tradi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new culture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Key words: changing prevailing habits and customs the changes of 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 the trend of changing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徽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余红　　签字日期：2007 年 4 月 25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安徽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余红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07 年 4 月 25 日　　签字日期：2007 年 4 月 25 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13514987348

通讯地址：合肥市宿松路174号　　邮编：230022

前 言

一、选题的理论依据、学术价值及现实作用

本课题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原因、特点、变化趋向。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社会风俗变迁十分缓慢，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又不可否认存在着急速变迁的事实。清末民初社会风俗打破常规，相对迅猛地变迁。其中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的服饰风俗也发生较大的变迁。变迁中民众对服饰表现出求简、求新以及融合变通的价值趋向。这种变化既有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也是传统文化广博的包容性所致。服饰在变迁中凸显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服饰变迁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服饰风俗变迁规律的认识，从而发扬与发展我国的传统服饰文化。

本选题以清末民初移风易俗社会思潮为背景，研究服饰变迁的成因、特点以及它的变化趋向，对深化社会风俗史、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应有一些裨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饰风俗的变化非常大。本文通过探讨这一特定时期服饰风俗变迁，揭示服饰风俗变化规律，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服饰风俗改良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学术史综述

由于本文是从清末民初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思潮入手来探讨服饰风俗的变迁，因此在学术史上兼顾思想史和社会风俗史两个方面。

1、资料的发掘

对于清末民初风俗的记载，除了《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清代北京竹枝词》、《燕京岁时记》等少数几本书以外，多散见于方志或个人笔记中，并且数量繁多、记载零散，整理较难。这对于研究风俗演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尤其对于服饰风俗的记载更是零散、浩繁。随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报纸、杂志资料补充了典籍记载的不足。《申报》、《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清议报》、《游学译编》、《女子世界》、《民报》等都为研究服饰风俗提供丰富的资料。

而此时期思想文化的研究资料较为充足，著述颇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辛亥革命回忆

录》、《章太炎政论选集》、《孙中山全集》、《康有为政论集》、《革命军》、《秋瑾集》、《梁启超选集》等资料的整理及著作的出版为当时社会演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学术研究状况

民国以来关于风俗的研究包括：周振鹤的《苏州风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贾逸君的《中华妇女缠足考》（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林惠祥的《民俗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而属系统性风俗志书和风俗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主要有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以及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其中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分为44卷，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几乎涵盖了风俗学研究的所有对象；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分上下两编，共60多万字，摘选历代古籍，近代报刊杂著，各省的风俗资料，是风俗史研究者经常查阅的资料。以上著述中都有一些服饰风俗的记载，为本课题提供了资料和借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服饰方面的论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服饰进行研究。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开创了现代服饰研究的先河，该书作者对从商朝到清朝各个朝代的服饰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蔡子谔的《中国服饰美学史》从美学的角度阐述历代服饰的特点和变迁。老照片编辑部出版的《风物流变看沧桑》中有许多幅清末民初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从中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服饰的变迁。华梅的《服饰与中国文化》从中国服饰观念与中国哲学，中国服饰制度与中国礼制等方面阐述服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林涵的《着装学》论述服装的演进趋势以及其变革的动因。王东霞的《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论述了近代服饰的变迁过程。楼慧珍、吴永、郑彤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通过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论述，强调了服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与相互影响的渊源。徐杰舜主编，万建中、周耀明著的《汉族风俗史》运用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探讨了汉族风俗的嬗变，展现了汉族风俗的历史全貌。其中的晚清民国卷中有服饰方面的论述，为本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还有戴平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杜钰洲、缪良云的《中国衣经》、王维堤的《中国服饰文化》、

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等等。

而研究清末民初服饰方面的论文则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程为坤的《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团体》、金炳亮的《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王开玺的《传统服饰与近代外交》、卞向阳的《论晚清上海服饰时尚》、李跃乾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张荣国的《服饰：一种隐喻的表述》、高霞玲、成小明的《略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政治文化意义》等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史实性的简单描述，逐渐深入到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与此同时，对服饰风俗嬗变的成因也予以更多关注。

此外，港台及海外一些著作也涉及到这一时期的风俗研究。如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谭永年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崇文书店编的《辛亥革命论集》、张玉法的《辛亥革命史论》、（美）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美）EA罗斯的《变化中的中国人》、（英）阿绮波德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3、存在的问题

（1）服饰风俗考察倾向于对服饰的具体解释，而忽视促进服饰风俗变迁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文化根源等诸多因素。静态的描述过多，动态的变迁诱因较少。

（2）关于清末民初的服饰变迁，从文化方面阐释的著述不多。有的虽有论述，但不够具体、深入。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针对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社会背景（2）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特点

由于本课题属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交叉领域，在写作上有一定难度，由于民间底层的材料难以搜集，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在借鉴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创新：（1）在史料上，大量采用《申报》、《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妇女时报》、《湘报》、《神州女报月刊》、《社会世界》等原始报刊资料，力图真实反映当时社会风俗原貌。（2）在方法上拟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服饰变迁的原因及趋向，并从传

统服饰文化的源流上去探求此一时期服饰变迁的根源。

四、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思路

本选题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去阐释清末民初时期的服饰变迁。分三个章节进行论述，重点是第一章和第三章。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社会背景：传统风俗弊端重重，阻碍社会进步；各政治派别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造中国，或改良，或革命，都得开通风气，“新民”和重塑“国魂”。移风易俗成了社会关注的共同问题。社会精英们纷纷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规陋习，提倡新的生活方式。新思想的传播，新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新法令的颁布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革，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思潮因此风生水起。其中服饰变革是移风易俗的明显表现。

服饰文化是一个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服饰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主要特色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衣冠之治”，它以其广博的包容性吸纳他民族的服饰特色并不断发展、传承。清末民初服饰变迁极为迅猛之际也未斩断它的承继。由此可见服饰变迁发生在移风易俗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有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第二章清末民初服饰变迁主要趋势：在纷繁复杂的服饰变迁中，男子的剪辫与女子的放足显得尤为突出。此外服饰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由西装的流行到中装改良的演变过程，最终服饰的变迁仍然趋向于“去除糟粕，吸取精华”，兼容中西，出现了民族特色浓郁的新式服饰。

第三章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特点：虽然清末民初服饰在总体上都发生了较迅猛的变迁，然而在变迁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由于地区政治影响、经济发展及文化程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因此，从服饰变迁的速度来说城市快于乡村，中上层社会快于下层社会，南方快于北方。然而，在服饰变迁中也反映出相对一致的民众求变的价值趋向，这种趋向就是：求简、求新、融合变通。这也使该时期服饰变迁突破旧的传统具有时代性的明显标志。同时，服饰变迁中还体现出传统的人文关怀精神，凸显出人们追求文明生活的健康心态。从而可以得出结论：清末民初处于社会转型期，为

适应社会的变化，服饰上出现了较为迅猛的变化。这种变化多是倡导者的用心，反映出追求时代的步伐及坚定改革的愿望。此外，服饰变迁还象征了新时代、新世纪的开始。但服饰变迁并非全盘抛弃旧服饰及全盘接受新式服饰，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并合理地保留，如长衫、旗袍等。主要趋向则是追求舒适与美观。这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服饰求简、求新、融合变通的趋向凸显出时代的特点和鲜明的民族个性。这种趋向既有政治因素也是传统文化广博的包容性所致。

第一章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社会背景

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社会风俗变迁十分缓慢，它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社会风俗（包括社会风尚与风俗习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往往随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里或急剧或缓慢的变革，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演变。”[①]清末民初正是处于这样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为社会风俗的变迁提供了物质基础；政治上，除了一些人仍在贩卖“古时丹”外，更多的则是把西方各种政治学说陆续介绍到中国，并在中国进行不同程度地实践；思想上，在放眼世界以后，打破了固有观念的束缚，平权思想，科学精神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引起日常行为习惯的改变。尤其是移风易俗思潮的涌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层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服饰风俗也随之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迁。

服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着自己独特的象征意义，素有“衣冠古国”之称的中国对服饰的社会功用尤为重视，而传统服饰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衣冠之治”。 从衣冠来“昭名分，辨等威”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承继。时至清末民初，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突破传统服饰的规定，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摒弃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中传承了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皇帝皇后的龙袍凤冠、达官贵人及其夫人的补服，统统成为历史的陈迹。社会上呈现出新陈代谢的气象：“新礼服兴，翎顶补褂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②]服饰上的新观念、新思想也随着人们外在服饰的改变而迅速传播。这种变迁顺应移风易俗思潮而生，又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发展。

一、服饰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

服饰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服饰文化则是一个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漫长的中国历史积淀出厚重的传统文化，其中的服饰文化不仅

[①]严昌洪《社会转型与风尚演变—民国社会风俗变革的若干特点》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②]《新陈代谢》《时报》1912年3月5日

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特质文化的创造，而且也凝结和渗透着中国哲学美学观念。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很注重服饰的社会功用。孔子曰："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追求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理想，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对服饰的主张则是"衣服有制"。再加之其他诸如墨家主张的"衣必常暖"；道家的"被褐怀玉"以及"不饰于物"；法家的"好质而恶饰"等等都成为传统服饰文化的思想渊源。正是在各种服饰观念的互相影响下，"中国服饰文化走出了实用功能的局限，成为政治伦理观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等级秩序具象表征。"[①]独具民族特色的"衣冠之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也正因为它的功利性才得以长存与传承。

服饰起初的基本功能是用来蔽身体，防寒暑的，稍后又有了美化自身，吸引异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区别身份尊卑贵贱成为服饰新增加的功能，也是传统服饰在封建社会中表现出来最为典型的社会功用。从规定诸如冠服制、冕服制、深衣制等服饰制度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同时也从衣料的裁剪、饰物的配戴对人进行道德教化。例如君子玉不离身，玉象征美好的品行；王冠上垂下至两耳边的充耳是用来提醒帝王不要轻信谗言，因此就有成语"充耳不闻"；深衣用十二幅布裁剪制成，喻指一年十二个月，预示对"天人合一"的追求。诸如此类的服饰制度被统治者作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历代都在在不断地吸纳其他民族的服饰特点并加以改进的基础上传承着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

绵延数千年的"衣冠之治"是中国服饰文化的一大特色，其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分尊卑，别上下"。它的核心是通过等级森严的服饰规定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对于不同人的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诸如"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贵贱有等，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等等。外在的服饰不仅成为身份的认同，也反映出文明开化的程度。平民穿衣，不准有文饰，称为白衣；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着绫罗绸缎，叫做纨绔子弟；"披发左衽"指代文明程度低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夷夏服式观念纷争历史上屡被挑起。除此以外，服饰还成为表达内心信念，寄托乡土情、爱国情的方式，苏武流亡匈奴十九载不改汉家衣冠即为明证。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在

[①] 黄燕敏《服饰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维度》《学术交流》2004年7月

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几乎同一式样的包裹型的传统服装使得 “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①] 在压抑人的个性发展的同时，也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继承并发展着“衣冠之治”。

而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廷也于1652年制定《服色肩舆永例》。不但对不同品级文武百官朝服与常服的样式、色彩、质料、纹样作了详细的规定，对士绅、兵民、商贾的服饰也作了具体的限制，要求上自皇帝、亲王、贝勒后妃，下至文武百官、士农工商，均须“依制着装”，倘有违制，以“僭越”治罪。“衣冠之治” 之所以得以传承是因为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自有其代代相传的内在属性，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因而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甚至到清末民初服饰变迁极为迅猛之际也未割裂它的承继，最终服饰的变迁仍然趋向于“去除糟粕，吸取精华”，兼容中西，出现了民族特色浓郁的新式服饰。尽管这种变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亦日益显出它的勃勃生机。

然而“衣冠之治”的传承，并非仅仅是简单的世代相传，而又有着对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吸纳与改进，同时也有少数民族对汉族服饰的学习，从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最终使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共同发展。总的来说，服饰文化的互融、吸纳的动因主要有文化上的交流、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思想上的进步与开放等等。因此历史上诸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佛教的传入，唐王朝政治思想上的开明都对服饰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专制的封建社会，服饰文化的改进与学习虽然多为统治者的用心，却也收到很大的成效：不仅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也加强了各民族的大融合，更是丰富了服饰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以下几个朝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开始实行胡服骑射，赵国强盛起来；北魏孝文帝下令禁胡服，服装一依汉制，此后北朝衣着更进一步汉化。一些服装也有胡汉风格结合的特色，再加之政治上的汉化，文明程度得以大大提高；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著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交流，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使得唐代女装的形制趋向暴露和开放。开元初，袒胸女装盛行，靓装露面，无复遮蔽，士庶竞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著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

[①] 林语堂《林语堂散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服饰上的开放在封建社会中达到了顶点。丰富多彩的服饰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开明，也折射出思想文化上的开放，同时又体现传统服饰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这种吸纳与传承仍体现于清末民初的服饰变迁中，使得该时期的服饰变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移风易俗思潮的影响又凸显出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时代性。

再看清末民初的服饰变迁，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其他因素的考虑，要求废除“衣冠之治”，改易传统服饰，毫无疑问成为服饰变迁的主流。当时很大一部分人提倡改装易服的逻辑是：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明发达，学习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就得穿着西式服装。因为“衣服装束与西人同，则酬酢也相和洽，无形格势禁之疑；衣服装束与西人同，则往来查察事务于政学工商取资不少，无猜忌凌辱之患。”[①]而传统的服饰就成为另类的“异服”，不仅有碍于观瞻而且从外观上也得不到与之交往的外国人的认同。再有“衣冠之治”显然有违于西方文明中的平权学说，自然成为历史发展的羁绊。因此“合古今中外而变通之，其唯改易西装，以蕲进于大同。”[②]正是由于勇于吸收他民族的文化为我所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之意，使得穿着西式服装能够较为容易地得到响应与流行。只不过此时吸收他民族的文化的目的不同于以前的对其进行同化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已经被打破了。但无论如何，仍可看出传统文化具有广博的包容性。

二、清末民初移风易俗思潮的形成

中国传统风俗是指古代农业宗法社会产生，传承了千百年的旧风俗习惯。它广泛渗透着封建伦理观念和封建迷信观念，诸如纲常伦理、男尊女卑、事鬼神、信卜筮等都是封建社会中长期流行的陋习。这些陋习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它视为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因素，认为：“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甚指。”[③]若要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良社会，废除陋习。移风易俗自然与政治变革联系起来。社会精英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国家之政事，譬之寒暑表也，民间之风气，譬之则犹空

[①]《论发辫原由》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748 页

[②]同上

[③]严复《严复集》第 1 册诗文（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8 页

气也，空气之燥湿冷热，而表之升降随之，丝毫不容假借。”[①]因此开始着眼于对社会风气的改良。力图通过改良社会风气，借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军齐力，万马齐鸣，三年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②]

清朝晚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志士们为配合政治上的变法要求，力倡社会风气的改良。他们意识到变法的成败与当时的风俗人心密切相关，因此十分重视风俗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因为如果不革除那些愚昧、落后、野蛮的风俗，那么即使有再完美的政治、经济、文化改良措施，也会被旧风俗拖累限制，不能在中国实行下去。这样变革社会风俗不仅是培养新型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造就新型国民的需要。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斯实民族主义文化之根柢源泉也。”[③]因此他们认为只有革除旧习，才能树立新政。并且以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救亡为出发点，从社会风俗与国家命运、政治进步、民族精神的关系等方面论证变革社会风俗的必要性。而革除旧习，报刊宣传必不可少，因为“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当时的《湘报》、《国闻报》、《时务报》、《女学报》等在对旧风俗的移易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倡导下社会上掀起了移风易俗思潮。这股思潮从剪辫易服、禁烟禁赌到废除奴婢、男女平等和破除尊卑观念，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要求解放妇女、兴办女学、反对缠足、提倡天足、破除迷信、禁止吸食鸦片逐渐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天足会”、“戒缠足会”、“戒烟会”、“剪发会”、“万国改良会”等社会团体相继设立。他们的活动起到了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的作用，甚至对当时的朝廷也产生了影响。载涛等人也认识到“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朝廷中遂形成一股较强大的剪辫势力。

革命派也将政治变革与风俗的移易相结合。他们认为“变政而不变俗，则政无由施；变俗而不变政，则俗无由此。盖政与俗，决不能相离而论也。”[④]他们更是将移风易俗作为宣传革命、推动革命的一种手段。1911 年的辛亥革命创造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共和民国，但在思想领域里，民主共和、自

[①]《开民智法》《大公报》1907 年 8 月 3 日
[②]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湘报》第 26 号
[③]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09 页
[④]《论改良政俗自上而下之难易》《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1 期

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渐入人心，陈规陋俗成为抨击的对象。“其为祸之烈，小足以破业陨身，大足以亡国灭种。”[①]为了尽快革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风气，先后颁布了禁止买卖人口、剪除发辫、禁缠足、禁烟、禁赌等一系列法令。对于那些不符合民主思想的天地君亲师牌位、跪拜礼仪、服饰习俗、婚丧仪式、家族制度都被废除或改变。在新政权的干预下，社会舆论也纷纷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各种社会团体也相继成立。如：社会改良会、服用救国会、体育会等大力推行新的更适合新时代的城市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据统计，民初移风易俗的团体共 51 个，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反对封建压迫及等级秩序习俗的团体 8 个，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的团体有 16 个，提倡民族精神、扫除半殖民地颓风糜习的团体有 13 个，以社会教育为职志、破旧立新的团体有 14 个。[②]这些团体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推动了移风易俗思潮的发展。

而到五四运动前夕，曾受到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巨大冲击的旧风俗在袁世凯复辟时又死灰复燃。陈腐的封建礼俗有所抬头。尊孔读经、祀孔祭天、跪拜行礼与前清无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意识到“救人”更为重要。只有伦理觉悟，人的个性解放，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因此必须进行道德革命以改变全体国民滞后的道德面貌。新文化运动志士们还从婚姻家庭方面剖析封建礼教及旧道德习俗造成的种种恶果，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去论述改变旧习俗的迫切与必要。

三、清末民初服饰的变迁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发生在移风易俗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之所以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有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

[①]《临时政府公报》29 号
[②]程为坤《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团体》益阳师专学报 1989 年第 2 期
[③]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7 页

面的原因。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①]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引起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风俗的变革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国人"日用起居饮食衣服之琐细，无不仿效欧西，一变曩日淳朴简陋之旧习……"[②]。其中服饰变革更是重要的一方面。在与西式服饰的对比中，人们觉得中国"衣饰之繁缛……一冠也，有凉帽，有暖帽，有朝帽；一衣也，有便服，有公服，有吉服，有素服，自寒徂燠，不一其类，领异标新，多数百箧，少亦不下十数箧，章服之繁，为五大洲所未有。"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如果能够"发不待束，衣不须更，旋转自如，兢擘工制，不尤为直捷轻便乎？"[③]并且褒扬易服的好处：借以变法、借以养廉、可以强兵、可以强种、可便行役、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弭教案。因此大力倡导服饰改革。

资产阶级还把提倡西装作为向西方学习的表现形式。"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更是把着西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既有西装之形式，其不能不有所感触，进而讲求西装之精神。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厉，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性根。且既讲求其精神，其不能不取法西人所谓政学、法律、工艺、商农之美法，一一而举行之矣。"[④]除提倡穿西服外，还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则提倡恢复华夏衣冠，并把它与反满紧密结合起来。"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⑤]易服显然成为号召民众革命排满的一种手段。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此意"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以至于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复我冠裳'成为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辛亥革命后，在浙江就有人"头戴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配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⑥]还有许多人为了恢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② 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

③ 《剪辫易服说》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74页

④ 《论发辫原由》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48页

⑤ 章太炎《解发辫》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页

汉族衣冠，竟然穿成奇装异服了：有的绾结成道装，有的束发，有的披头散发，有的剪长辫为短发。然而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加之民众穿着长袍马褂已成习惯，还有汉装以森严的等级区分尊卑贵贱的衣冠之治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使得汉装没有得到复兴。但无论是学习西方还是反满都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除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服饰变迁的推动力还有自我解放意识的提高。尤其女子服饰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自我解放的要求。清末女子解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社会精英纷纷倡导戒缠足、兴女学等活动。一些知识女性不仅走出了家门，甚至走出了国门。她们受到来自西方的天赋人权说、进化论和女权理论的影响，追求男女平等，要求自我解放，从而引起了服饰上变化。有的女子甚至着男装出现于公众场合，这是她们表达与男子平等的一种方式。女革命家秋瑾就曾说："我实在是想具有男子那样的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都变成男子。"[①]从传世的照片上，我们可以见到她女扮男装的形象。与男子反满要求恢复汉装正好相反的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妇女受满族影响，以穿着旗袍为时尚。"髻鬟钗朵满街香，辛亥而还尽弃藏。却怪汉人家妇女，旗袍各各斗新装。"[②]这恰恰反映出女子在服饰方面对美的追求起着主导作用，也反映出她们审美意识的变化，这不能不说是女子自我解放意识的提高。

人们提倡改易服饰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民众总的来说还是很贫困的。虽说传统服饰文化提倡"衣贵洁，不贵华"，然而对不同场合、不同季节的穿着都有很多讲究，弄得很繁琐。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中就有这样一位"洋装朋友"对别人道出其改穿洋装的原因："只因中国衣裳实在穿不起，就是一身茧绸，也得十几块钱。一年到头，皮的、棉的、单的、夹的，要换上好几套，就得百十块钱。如今只此一身，自顶至踵，通算也不过十几块，……"因此他认为："改了装没有别样好处，一年裁缝钱可以省得不少，二来无冬无夏只此一身，也免到了时候，愁着没有衣服穿。"同时又满足了他崇洋的心理。而对于一般的官员来说，每个季节都得购置每个季节的衣服"非但购置之初耗费不资而已，宦游远地，行李往来，筐箧累累，有如山积，舟车不得不多，仆从不得不众，旅资不得不巨……"[③]因此作为中产阶级，单从节约的角度讲，易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

[①]高大伦等编译《中国女性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 页

[②]吴思训（清末）《都门杂咏·妇装》第 624 页

[③]《剪辫易服说》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最后，社会心理也是服饰变迁的重要原因。民国肇建，形成一个显著的追求大兴大革的社会心态。当时，由于民主共和政体取代了帝制，国民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许多旧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新观念应运而生。在民初很快就形成一种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尚，谁就是文明开化，属于新派人物。否则就是保守顽固之徒。因此追求生活上洋化的阶级和阶层流行起来。在清末受到压制的各种观念迅速蔓延到革命势力所及的城市，那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服饰等级制度被打破了。以江西宜兴的一个婚礼场面为例："自民国以来，政体虽变，而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学时髦者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堕落及地。"而四个陪宾"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①]这样的场面虽有些不伦不类，但可看出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再没有等级界限和服制规定，这些也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审美上、习俗上的变迁。

新思想的传播，新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新法令的颁布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变革，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思潮因此风生水起。其中服饰变革是移风易俗的明显表现。当时人们意识到服饰在与人交往中具有独特的情感认同功能"夫人与人相处，最易生感情者，莫如性情、语言、衣服装束。而性情如何非久处不知。语言如何非问答不知。若衣服装束，则一望而见其与己同者安之，与己异者骇之；与己同者喜之，与己异者恶之。人情之大较也。"[②]那些体现旧式礼法精神和等级制度的服饰、发辫、缠足等显然已经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了，并且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给国人带来耻辱和痛苦"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③]由此可见服饰变革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广泛要求。

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虬在他的《救时要义》中就提出更服制的思想，此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也对此加以讨论，但政府却毫无反应。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先后上了《请断发易服改元》和《请禁妇女裹足》的奏折，呈请光绪帝在变法推行之际，下诏剪辫易服，禁止妇女缠足。黄遵宪更是历数缠足七大

474页

[①]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②]《论发辫原由》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45页

[③]同上

害：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剪辫和放足不仅被视为改变国人形象的重要举措，也成为尊重人权，人性解放的重要标志。留日学生更是率先断发易服，并要求清政府仿效俄、日“诚下诏旨，令悉变西服，剪发辫，定一不从之律，官服亦惟西国是从，则中国如昔日俄、日本然，必大改厥观耳目一新，精神不患其不振，风气不患其不开。”[①]随着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服饰“非更新不足以救国，且非改视易听，不足以一国之趋向，振国民之精神。”[②]他们还以报刊为阵地大力宣传鼓动服饰移易。1903年《湖北学生界》上登载了《剪辫易服说》认为“今之辫服，牵挚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公开主张剪去发辫，更换长袍马褂。同年《皇帝魂》上发表了《论发辫原由》一文，文中也认为“今日之中国，诚欲变法自强，其必自剪辫易服始矣。”

民国成立以后，旧式服饰风俗更是受到政府和社会精英的否定。他们对新的国人形象充满了憧憬：“女子把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缠脚。”[③]当时《时报》甚至有人如是描述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④]其中虽不乏戏谑的口吻，但也生动地反映出国人外在形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孙中山对服饰的变革也很重视，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并与“中华国货维持会”书信往来，讨论服装改革问题，还设计出“国服”——中山装。

[①]水钧韵《论中国开风气之法》《国闻报》第297号，1898年8月27日

[②]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页

[③]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8页

[④]《时报》1912年12月1日

第二章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主要趋势

在移风易俗思潮的推动下，民众服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在纷繁复杂的服饰变迁中，男子的剪辫与女子的放足显得尤为突出，此外服饰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由西装的流行再到中装的改良的演变过程。民众对服饰的追求也从盲从到理性，出现了融合中西的新式服装，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色。

一、“从头开始”与“始于足下”

男子服饰的变迁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从“头”开始。男子薙发留辫原本是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接受的，而汉族男子一直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是不会剃发的，于是在清初“留辫不留头”的血腥政策下曾发生许多悲剧，因此清代男子留辫不仅是习俗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而到了清末，或是为了学习西方，或是为了反满，宣传家们也对“辫子”作起了文章。辛亥革命以后，剪辫与否又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其有保存发辫者，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为满奴”[①]于是全国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剪辫的热潮。南京临时政府也下令强制剪辫，要求：“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②]尽管此令能否彻底执行存在着很大问题，但仍可看出政府革除旧习的决心。剪辫和易服是紧密相连的。剪辫后，男子大多戴帽子，于是各种式样的帽子流行起来。“民国以来，男子皆剪发，且风气日升，夏季之草帽，销行日盛。”[③]1912年10月4日临时大总统命令参议院议决服制中对礼帽作出了规定：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由此可见，戴帽子已成为男子的服饰习惯。

相对于男子服饰变迁的“从头开始”，女子服饰变迁可称得上“始于足下”。缠足是我国特有的以伤残妇女之足为美的陋习，由于其历史悠久，改革的难度极大。尽管清初也曾下令禁止缠足，但直至清末仍然“女子多缠足，不轻外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对其进行抨击。认为缠足“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女”要求“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

[①]《大公报》1912年11月20日
[②]《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
[③]《申报》1912年11月20日

除，以培国本。”[1]因此民间的不缠足运动进行得有声有色，尽管在偏远地区及农村缠足仍较普遍，但是在社会上层和城市里仍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引起了足饰的变化。以前妇女的鞋袜全部自制，费时伤神，放足后她们终于走出了家门，自选鞋袜。时人对此曾这样描述的：“当中国妇女缠足之风盛行时，无论如何履必自制，且双弓藏诸裙底，往往不使人见。自提倡天足后，渐臻大方，无此羞涩之风。故往往履不自制，而购肆中，且在广众中脱履露足以试履之大小者”[2]可以看出服饰变化中也反映出观念的转变。一些年轻的都市女子开始讲究鞋的式样，穿着皮鞋，更对洋式高跟皮鞋趋之若鹜。《申报》曾对这种变化作了形象地描述：“往来短巷复长街，革履声喧橐之偕；转眼清明佳节近，无须重绣踏青鞋。”[3]稍后，还流行起了长筒袜，在西式履与中式旗袍之间和谐过渡，别有韵味。

二、西装的流行

既然要易服，该易成什么样的装束呢？康有为在 1898 年上书中要求清帝下令断发易西服以示彻底变法维新。此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就应穿着西装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认为：“合古今中外而变通之，其唯改易西装，以蕲进于大同矣。”很多人还身体力行，以西装革履示人。“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4]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下，穿西装逐渐为城市男子所接受，尤其是青年人。其中以学校的学生、教师、公司洋行和机关办事员为主。对于西服的提倡还基于这样的心理：“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5]

清末民初，社会精英们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深切体认到中国的落后，纷纷把目光瞄向西方，希望中国也能效仿西方国家，学习西方文明，达到摆脱耻辱、摆脱落后的目的。而长期形成的陈规陋习也因其具有顽固性，成为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绊脚石，马克思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

[1]《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32 页
[2]《论上海女学生的装束》《妇女时报》第 11 期
[3]《申报》1912 年 3 月 20 日
[4]《论维持国货》《大公报》1912 年 6 月 1 日
[5]《申报》1912 年 8 月 20 日

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1]因此一些人的顽固守旧的心理和行为受到了猛烈地抨击：“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一进，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卫生，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2]而西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自然成了效仿与提倡的对象，其中包括穿着西式服装。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为西装流行于中国提供了契机。

众所周知，革命的指向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与其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服饰习俗自然是革命派所大力提倡的。“在海内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穿西服的最先进最坚决的代表。由于革命的胜利，他们便成了影响民国新服饰的最重要力量。”[3]也成为人们模仿的榜样，从而带动了西服的流行，就连做西式服装的成衣铺生意也红火起来。1913 年 3 月的《申报》上有这么一则广告：“……今因贵国共和已成，屡见各界陆续剪发易服，去旧更新。敝行有见于此，特由英京运到各色新式呢布衣料以备各界诸君惠顾，定价从廉。并有洋帽、领子、领带、内衫以及一切所配之另物无不齐备。……”从中不难看出西式服饰已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圈子，并引导着装的潮流。

这股潮流很快又演进成对西式服饰的狂热追求，以至于“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接受，可见一斑。”[4]尤其是青少年喜着西装，女子也间有剪发洋装者。北京的学生甚至有了“赤胸露肩，短袖青衣，云环高垂，皮鞋耸底”的摩登打扮。他们对服装的面料也发展到“非舶来品不御”的地步，真正是形成这样一种心理：“中国之缎甚好，偏爱穿外国缎；中国之纱甚好，偏爱买外国纱；中国之呢甚好，偏爱用外国呢……”[5]于是“架着一副金丝小眼镜，戴着一顶外国困帽，脚上穿着一双皮鞋，走起路来格吱格吱的响，浑身小衫裤子，一律雪雪白”[6]的中国人在城市中也是随处可见的。甚至于在偏远的小城市也“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17 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4 页

[3]李跃乾《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怀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4]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散文全集》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7 页

[5]《偏爱》《申报》1912 年 3 月 11 日

[6]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 页

对待西式服饰的心理从一开始的“从同为宜”、“蕲进于大同”发展成为唯洋是从，乃至惟恐学不象。

对西式服饰狂热追求的负面作用很快便显现出来。首先是经济上的浪费和难以承受。穿西服不再像起初那样“一年只此一身”，方便、节约，而是随着西装的流行，人们对着装开始讲究起来，西装的配伍也显得繁多、复杂。男士穿西装自然要配衬衫、打领带、穿皮鞋，甚至于戴眼镜、戴手表……而当时时髦妇女的必备品则有“尖顶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①]这样的装束不仅造成了浪费而且对社会风气也产生不良影响，形成了互相攀比、追求奢华的习气。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文明生活”：“其欢迎文明也，不过如儿童之欢迎玩物。但求纵其欲望，他无所知。”[②]其次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新的不平等。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传统意义上的等级制度基本上被摧毁了。人们在着装习俗上不再受到制约，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平权精神的。然而随着对西方生活方式地盲目追求，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观念也随之带来，人们开始以占有金钱的多少来暗分等级。服饰又成为人们身份的外在标签，只不过这种标签上写的不再是贵与贱，而是有钱人与穷人。他们也从社会中得到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待遇。穿着时髦的洋装自然成了有钱人的象征，于是追求西式服装便愈演愈烈，“以貌取人”成为社会通病。鲁迅就曾写道：“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所以有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③]最后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力量原本就比较薄弱，辛亥革命期间虽有所发展，但仍然难以与外国资本抗衡。大量地购买洋货导致国货的销路深受影响，无疑又使得民族经济雪上加霜。这种状况更能引起社会精英的反思与关注，他们多是以此为立足点，表达对此种状况的担忧：“长此不变，金钱日益输出，社会日益奢华，而亦日就穷蹙，岂非未来之困难耶。”[④]并且对当时社会生活变迁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理性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尤其把矛头指向一些年轻人：“我看如今这些少年们，实在可虑。他们看着

[①]《时髦派》《申报》1912年1月6日
[②]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
[③]鲁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
[④]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

外国事，不论是非美丑，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1]对西式服饰狂热追求所带来诸如此类的不良影响很快引起人们的理性思考，并为寻求解决方法而作出不懈努力。

三、中装的改良

针对盲目追求西式服饰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有识之士开始对此进行剖析：“是吾社会乃物质文明之销耗场，而非物质文明之生产地也。吾社会人民，乃使用物质文明之人类，而非制造物质文明之人类也。”[2]一味地追求洋货，消费洋货，不去生产、推销和使用本国的商品，势必不利于自己国家的物质文明的生产。于是从导致此种状况的根源着眼力陈其弊：“自开海禁，人尚新奇。于是舶来货品充斥中原内地，金钱灌输外域……若此时再不从根本上解决，力图挽回，恐此将涸之源泉必为外货所吸尽，国亡种灭，祸不忍言……”[3]他们再一次地体会到了国家的危机感，而且这一次的危机更甚于政治上的危机“……吾人生命不亡于水火刀兵与恶劣政治，而亡于红男绿女身上所衣的舶来品。”试图以这种近乎危言耸听的言辞引起人们的注意，促使人们警惕和思考。并大声呼吁“值此危急存亡之秋，非四万万同胞一心一德维持国货不能立足于世界。”[4]因此一些提倡国货的社会团体便应运而生，其中上文所提到的中华国货维持会最为著名，他们为新式服装的设计作出很大贡献。从而引导人们对着装的追求趋于理性。

正是由于在当时革故鼎新，倾向西制的心理影响下，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竞从西制，致使西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5]从而对民族资本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社会精英从民族情感出发主张“衣帽不拘旧式新式，务用国货制者。”更有甚者把西装视为导致国家财力日益枯竭的根源，呼吁国人选用本国衣服。而政府从支持国货方面着眼也并非大力推广西服。孙中山先生在制定礼服过程中也考虑到此种因素：“而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不难看出“未尽合者”的背后有着浓厚的爱国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此外加上民众长期形成的服饰习惯，使得中装仍为大多数人所穿。因此民初男子衣着大多保持清朝旧制，以

[1]《大公报》1903年4月7日

[2]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

[3]《维持国货之急切》《申报》1912年6月5日

[4]《国货维持会记事》《申报》1912年8月20日

[5] 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62页

长衫、马褂为主，其在知识界仍为首选，如鲁迅、蔡元培等穿的多为长袍。而女子的衣着则为满族妇女穿旗袍，汉族妇女穿传统的上衣下裙。这些服饰从民国时期的图片以及一些影视作品中都可见到。

有识之士的理性思考与社会精英的不懈努力对服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使该时期的服饰发生了变化。除西装外，男士的服装有传统的长袍马褂，还有新式的学生装、中山装。虽然还很单一，但也预示着服饰变迁朝着多元化发展的开始。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社会女子服饰上形成的奢华之风，人们也力求改变，大力提倡女子应具有独立、自我解放的精神，应该追求女性的内在美，而不应该把时间耗费在穿着打扮上，“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成为“以悦男子之目”的玩偶。在对待女子的装束上也作了较为理性的分析：“女子不喜装饰，诚非其自然之天性矣。然大家风范雅淡为宜，纵不必裙布钗荆，过于俭啬，又何必增华踵事，轻涉轻狂乎？”[①]并且认为女子应注重内在，“装束为人之外观，而可从之以瞻内蕴者，故端雅朴素者，每使有知识者见而起敬若彼作时世之装者，则幸而博无知识者一羡而已。”[②]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 1909 年在香港组织“中国复古女服会”，该会宗旨是研究改进女子服装，促进女界文明。立志“损益中外古今”为全国妇女设计出一种标准服。因此女性服饰也发生了改变，除了放足、剪发、文明新装、中式旗袍地不断推广、流行，“爱国礼帽”的出现尤为典型。因为过去妇女是不戴帽的，而以首饰装扮，因此女子礼帽的设计是一项创新，它是以中国绸缎巧制成帽，既美观又卫生，又寓实行服用国货之意还藉以提倡女子整齐冠服。中国的女性也开始从“头”做起，承担起她们对社会应尽的职责，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若说要求改良中装的主要因素是对西式服装盲目追求后的理性思考，那么还在提倡着西装成为主流之际就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中装成为一部分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如前文所提到的反满的革命派，虽说“驱除鞑虏”只是他们进行革命宣传的口号，进而成为争取更多汉人起来革命的手段。但也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以“恢复汉官威仪”为职志的。“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

[①]《对于女学生之危言》《妇女时报》第 4 期

[②]《忠告女学生》《神州女报》月刊第 3 期

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大街上走。”[①]很显然资产阶级革命被一些人理解成了改朝换代。难怪阿 Q 对他们的穿着认定是戴崇祯皇帝的孝。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恢复汉装，但也成了传统服饰得以传承的“星星之火”，成为后来新式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再有就是成长于西方文明中，精通西方文化的怪杰辜鸿铭，却大肆鼓吹西方文明破产，未来的出路在中国，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便蓄发留辫，弃西装革履，穿长袍马褂，闭门攻读中国经籍。这样的穿着打扮是他过于极端的思想阐释。然而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西方传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只是不入流的孤寂的勇士，但也给人以反思，尤其对于那些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者。

由于中装西装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市场，因而辛亥革命后“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②]政府在服饰方面也很重视，力图设计出“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再加之社会精英的大力提倡、支持甚至于出谋划策，于是就有了中西结合的新式服装。“学生装”就是其中一种。这种服装不用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立领，穿时用纽扣绾紧，不用领带和领结。在衣服的下方，左右各缀一只暗袋，左侧胸前则缀有一只明袋。此外要数稍后孙中山先生改造英国式猎装而成的“中山装”，这种服装还被赋予了“四维、五权、三民主义”的道德教化作用，成为中国男装的典范。妇女着装也受洋装影响“竞尚紧小，伶俐可喜”，其中要数旗袍最为典型。起初，旗袍的式样与清末还没有很大区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没有从前那样宽阔，并一改过去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服装造型，式样不断翻新，可谓日新月异，如衣身缩短，腰身紧收以及缀以肩逢等，变得更为合体，更能衬出女性优美的曲线，成为中西结合最为完美的女装。

[①]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②] 《大公报》1912 年 9 月 8 日

第三章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特点

清末民初在移风易俗社会思潮影响下，服饰风俗发生较为显著的变迁。其变迁特点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均衡性，民众对服饰产生了求变的价值趋向，服饰变迁中也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

一、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不均衡性

服饰虽然总体上发生重大改变，然而在变迁过程中的不均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从服饰变迁的速度来看大体是城市快于乡村，中上层社会快于下层社会，南方快于北方。

（一）城乡差异

这一时期农村家族宗法制度仍占统治地位，人们思想受到的束缚多，导致风俗变迁受阻或缓慢地发生变化。轰轰烈烈的不缠足运动虽然也曾波及到农村，但仍有很多人担心："若从此不缠，轻则为乡里所羞，重则恐婚姻难定"因此"有此一念横梗于心，虽百方化导，亦难以动之。"[①]农民的衣着也比较简单，一般衣多短装，对襟，裤均扎腿，喜窄不喜宽。这样为了便于劳作。衣服的色彩也很是单调，多是比较耐脏的深色。"以深蓝色为主，灰色、黑色次之，单衣则白色、蓝色与紫花色兼用。"[②]关于女子服饰的颜色则有"红到三十，绿到老"的俗谚。此外经济上的极端贫困也是农村服饰变迁缓慢的原因。终日辛勤的劳作换来的仍是食不果腹的生活，更是没有余钱去改善着装。只得"一年盼望一年好，汗衫补成破夹袄。"而城市中宗法制度相对松弛，民众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经济上也较农村宽裕，受西方影响也较大，再加之便利的交通、媒体的传播等都使得服饰风俗较为快速地变迁。因此西装革履的男子、穿着时髦的女子也是随处可见的。尤其在大城市中，女子服饰变化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以至于"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

---

① 《呈请直督奖励天足禀稿》《大公报》1904年9月17日

② 《沙河县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93页

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①]

（二）社会阶层差异

尽管城市服饰风俗变迁快于农村，但在城市中各阶层服饰的变迁也是有所不同的。最终的根源还是取决于经济状况。正所谓“富人四季穿衣，穷人衣穿四季。”时人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变迁的状况发出感慨：“从前男子鞋袜，多半制自妇人，即从店家所购，每双不过六七百文。今上海妇女之鞋且须买穿，而西装少年购皮鞋一双，非化六七元不办……”[②]可见穷人则无力追赶时髦。

学生也是服饰变迁的领头军，男生剪辫易服，改穿西装、学生装以及后来的中山装。女生则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下穿黑色长裙，裙上不施纹绣，簪钗、手镯、戒指等首饰一概弃之，被称为“文明新装”。她们这样穿，为了表示自己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标明自己要做新工作、过新生活，她们穿新衣是为了做新人。而中国的学者一般清高，属于社会的上层。平民中的读书人，虽然也属于老百姓，但大多穿长袍马褂，明显与下层民众不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这样的代表。他是咸亨酒店唯一一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站着喝酒说明他属于穷人一类，穿长衫却又表明是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着装和社会地位的错位凸显了人物矛盾的个性，也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城市中做苦力谋生的居于社会的底层，不论何时，总是上穿便于做工的对襟短打，下穿方便快步行走的宽松肥裤。他们的服饰自然很少有变化。

（三）地域差异

一般来说，服饰变异的策源地往往是宫廷或京师。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到了清末民初服饰流行的中心首次不在京师而是移到了南方。这是因为南方原本经济基础好，对外开口通商又早于北方，还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南方城市长期居住，这势必对中国人的习俗产生影响。尤其是上海，开埠最早，也是中国最先建立外国租界的地方。外国人在租界建立了许多公用事业：西式马路、路灯、自来水等等。这些公用事业把先进的物质文明迅速地引进中国，从而引起该地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海很快发展成最为繁华的都市，“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

[①] 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散文全集》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7 页

[②]《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申报》1912 年 8 月 9 日

斗巧，日出新裁”[1]。同时上海也成为社会名流聚居之地，社会风俗自然也随之发生变迁，先是“沪上私设各学堂诸生之浮躁飞扬者，亦往往去辫改装，以示矫同之异……”[2]其他人紧随其后“时尚领袖不仅有绅宦名门而更多是商人、学生、买办、妓女等原本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下层的人物，青楼女子的时新服饰甚至成了良家妇女模仿的对象。”[3]上海俨然成为时尚的中心，引领服饰的潮流，其它地方也纷纷以上海为榜样，当时有一首歌谣很能反映这种情况。“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上海服饰变迁之迅速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逐渐形成一股攀比、崇洋的奢侈习气。“从前衣服暗分等级，非真贵家豪族，鲜有通身裘帛者。今上海龟奴鸨子无不以裘帛为常服，而一般学生更非舶来品不御。”[4]由此可见，南方服饰的变迁虽然迅速但也浮躁、盲目。

二、 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价值趋向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服饰的变迁。森严的服饰制度被打破以后，人们的穿着不再受到种种限制，在服饰上的价值观发生了位移。原本属于社会上层人的衣服，下层人在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自由选择。而在服饰的变迁中也反映出民众求变的价值趋向。这种趋向就是：求简、求新、融合变通。

（一）求简

总的来说，为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清末民初的服饰已较前大为简化，尤其是女子服饰的变迁表现的更为明显。民国成立以后，妇女们不再仅仅局限在家里，这就使得她们的装束比以前较为简单、朴素，除去了烦琐的装束。“文明新装”就是此种服饰的典范，不少妇女都喜欢穿着。头饰的变化也很显著。清朝时女子头饰原有耳环、髻簪、鋬架、鬓花、压发花、冠子花、压髻花等等，而到民国时常戴的头饰仅有耳环、髻簪和冠子花。这些也是女子自我解放后的新风尚。而在偏远地区和乡村，服饰的变迁并不明显。贫穷使得乡民们只得穿简朴的衣服。“乡村农家，男女均短装，壮丁往往于衣外系粗布腰带，用蓝布裹头……”[5]可见经济

[1] 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志·风俗

[2]《申报》1897年9月29日

[3]《申报》1880年3月23日

[4]《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申报》1912年8月9日

[5]《续安阳县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77年版，

状况制约着服饰的变迁。

（二）求新

服饰变迁的另一趋向是求新。以女子服饰为例，随着妇女们较多地走向社会后，在服饰上表现出多样化。“自从新民国成立，我们女子的妆饰够有多少样哪：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不剪发的呢，大半不梳辫子啦，有把髻梳在前面，象一朵花，象一个蝴蝶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的，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面的，有千百个式样。”[①]衣服的布料和款式、花样都不再单调，而显得争奇斗艳：“一衣服也，中国绸缎不足，有用外国绸缎者。不独材料已也，裁衣之新奇实有不可思议者，领高至四寸以上，而纽扣也，花边也，又各花样翻新，鲜艳夺目。”[②]时新的装饰丰富了妇女们的社会生活，也使她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就连婚礼上的装扮也发生了变化，民国时期新的文明婚礼中，新娘常常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衣绣红鞋绿袜一概不用。然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开始从妇女的衣着上判断她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对衣饰讲究起来，开始追求时髦的服饰，因此洋装更是风行一时。除了旗袍，大城市的妇女还喜欢着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等。以至后来电影明星、交际花引领时尚，上流社会妇女趋而从之加之报纸杂志等对新颖服饰的介绍和电影业的推动，使女式服饰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而民初女子服饰的变迁则是其过渡时期。

（三）融合变通

最后是融合变通。长期以来，汉族人就擅长吸取其他民族的服饰优势，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服装，例如民初男子穿着较为普遍的长衫马褂就是汉族的长衫和满族人的马褂相结合的产物。近代资产阶级顺应时代要求，倡导弃旧从新，做新时代的国民。梁启超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一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服饰文化自然也应取长补短。民众服饰经历一段“崇洋”以后，在政府和社会精英的倡导下，着装心态逐渐趋于理性，开始追求穿着舒适、美观。出现了许多结合中西优点的服装。如中山装、学生装等。这些新式服装与式样烦琐、穿着不便的西装相比，优点就是实用方便，

第100页

[①]《看我们女子被人家耻笑啦》《大公报》1912年6月27日

[②]《论上海女学生的装束》《妇女时报》第11期

庄重大方，穿着舒适。而改良旗袍最具代表性。既体现了中国女子玲珑的曲线，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成为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女子服饰的典范。这种旗袍在制作上融贯中西，服饰观念上解除封建传统的禁锢，凸显女性的自然美，也体现出东方女性温婉贤淑的特质。此外在服饰的搭配上也体现出融合变通的特色：旗袍加西式大衣，长衫配西裤皮鞋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些都反映出中西文化交融后服饰的多样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广博的包容性所致，真正体现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

至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服饰变迁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动荡时代和变革时代，服饰一直是各种政治派别或势力藉以自我认同、规范和整合的重要手段，通过服饰的合一性，来显示特定群体的存在力量。”[①]不论是提倡西装，还是恢复汉装，再到新式服装都是他们政治诉求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反映。特定时期的政治因素成为这一时期服饰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追根溯源从服饰文化源流来阐释这一时期的服饰变迁，则更能显示传统服饰文化广博的包容性，也使此一时期的服饰变迁具有独特的民族性。

三、清末民初服饰变迁中的人文关怀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和封建宗法家长制在中国可谓影响深远，它们的存在不仅“皆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也成为阻碍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人若不能独立，没有自我解放的意识，社会就难以进步。而纲常伦理就是套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中国社会举步维艰。因此人在思想上、身体上的自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人们“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②]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为许多人所提倡，与此同时也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旧的伦理观念，认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③]反对旧的伦理道德也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人权”、“科学”中的重要内容，吴虞、

[①]张荣国《服饰：一种隐喻的表述》《辽宁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3 页

[③]《宪法与孔教》《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49 页

鲁迅、胡适等都向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和家族制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打破旧的伦理道德是解放人们思想使中国民众最终获得民主，拥抱科学和具有科学精神的必由之路。这些思想和主张对服饰的变迁也产生了影响。

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保守、中庸的思想在服饰上也有所体现。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服装的宽窄变化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因其同属包裹型服装，所以万变不离其宗，仍为宽松式样。男装宽体直身的廓型展现出东方男子的俊秀和内敛，程式化的裁剪造就了传统中一贯的直线平面结构。女装的包裹则更为严密。正如林语堂所言："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之不同，在于西装意在表现在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①]这样的服饰特点完全忽视了人的个性的发展，也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主""平等"思想相抵触。于是在西洋服饰的影响下以及社会精英的倡导下，服装的宽窄造型产生了变化，尤其是女子服饰的变化更为突出。

传统社会中女子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受压迫也最深。康有为曾指出封建社会对妇女"抑之、制之、愚之、闲之、囚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西方的平权学说传到中国后，对女子的解放起到促进作用，社会精英们也开始意识到女子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未来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②]而中国当时女子的状况实在令人担忧，因此尖锐地指出"今日中国所以哀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而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是一些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做法。他们倡导解放妇女，并利用报刊广泛宣传和组织不缠足运动，得到全国有识之士的支持，形成一定的声势。同时还把它同兴女学联系起来。因为缠足不仅"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罚，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③]女学不兴，女性的素质就难以提高，从而影响其对下一代的抚养教育。因此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女性通过和外界的广泛接触也觉悟起来，要求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无论自由党、社会党，均有女子入会，诚为数千年未有之举。"[④]与此相适应，她们外在的装束上就有了变化。民初妇女盛行剪发，她们

[①]林语堂《林语堂散文》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1 页
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第 1 册）上海：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1944 年版，第 44 页
[②]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第 1 册）上海：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1944 年版，第 44 页
[④]《时报》1912 年 4 月 7 日

认为“剪发之事既为世界文明国之通例，男子既割视殆尽，吾女子宜速去而无疑也。”[①]国民党的女议员们多数短发，给人以精明干练的印象。她们和男子一起参政、议政，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更为争取女性更多的权利作坚决斗争。除此以外最能反映女性服饰变化的要数新式旗袍。过去那种“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不再为人们所推崇，因为人“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人处于次要的位置，“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而现在是崇尚自由，讲求人权，“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②]从而展现出女性独特的魅力。这就是旗袍能够深受女性所爱的原因所在了。最后就连女性的内衣也走出闺房，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前面已经提到在封建社会，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女子服装的特点是闭锁。而在重重包裹中，最里层的内衣更是讳莫如深。在中国已行之千年的压迫束缚乳房的肚兜，在20世纪初被淘汰，为“可以助其身段之婀娜”的小马甲代替。后来小马甲因仍对胸部有压迫作用，经胡适等人倡导“打倒”而淘汰。对“天乳”，即女性乳房自然形态的提倡使得一种类似舶来品“形如围裙，而束于乳部之上，再以两带挂肩上使不坠下”的新式肚兜流行开来。[③]

再把清朝和民国初期女子的服饰作一番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不仅是服饰发生了变迁，而且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改变。清朝时期汉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平头圆髻，上着右襟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而到五四运动以后，女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女学生的典型形象则是清新素雅的新女性打扮，充满青春活力。她们一般上着浅色斧口衫，下着深色裙子，齐耳短发上系一条缎带，冬天则披一条围巾。而且女子时装店也逐渐多起来。对时装采取“立体剪裁”的方法，以突出妇女三围曲线，并且摒弃了束胸的旧习，真正从里到外给女性以自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在变迁中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①]《女子剪发议》《社会世界》第2期

[②]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散文全集》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③]熊月之《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结 语

清末民初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意识，开始人的现代化即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型。为适应社会的变化，服饰上出现了较为迅猛的变化。由于“在变革的时代中，服饰除了作为政治信仰的表述方式以外，还可标记和象征特定群体的思想、文化理念”[①]因此这种变化是倡导者的用心，反映出追求时代的步伐及坚定改革的愿望。此外，服饰变迁还象征了新时代、新世纪的开始。但服饰变迁并非全盘抛弃旧服饰及全盘接受新式服饰，而是有选择的接受，并合理的保留，如长衫、旗袍等。服饰在继承中有改革，有创新，但毕竟没有脱离传统的灵魂和韵味。主要趋向则是追求舒适与美观，这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自我解放意识的提高，从而加快了服饰变迁的步伐，而在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饰变化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服饰变迁的深层意义在于反映民众求变的价值趋向。传统的服饰习惯发生了改变，民众开始追求更高标准的审美情趣。服饰正朝着多元化、个性化方面发展。虽然这种变化主要是发生在大城市中，却也显出了时代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天，我们再反观清末民初时期的服饰变迁，从中会得到一些启示：中国服饰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个人躯体文化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社会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示着社会风貌。今天丰富多彩的服饰也反映出服饰文化的繁荣，而在繁荣并提高民族服饰新文化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形成新的服饰文化的思想资源和灵感来源。

[①]张从兴《青年着汉服祭民族英雄》《联合早报》2004 年 10 月 6 日

参考文献

资料、著作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2、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3、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

4、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79 年

6、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7、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9、《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0、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

11、《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12、邹容《革命军》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13、《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14、《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15、《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6、《张爱玲散文全集》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 年

17、《林语堂散文》呼伦贝尔市：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年

18、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9、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20、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22、胡伟希《辛亥革命与中国思想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23、田伏隆等《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郭学旺《孙中山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年

25、汤奇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7、严昌洪《西俗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8、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9、《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

30、薛君度，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1、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2、杜钰洲、缪良云《中国衣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33、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34、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林涵《着装学》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36、王东霞《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37、楼慧珍、吴永、郑彤《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39、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湾：台北南天书局，1981年

40、徐杰舜主编万建中、周耀明著《汉族风俗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1、王维堤《中国服饰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2、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43、张竞琼《服装—衣品如人品》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

4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45、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

46、路工编《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

47、老照片编辑部《风物流变看沧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48、王跃年、孙青《百年风俗流变：1900—2000》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

49、黎澍、蒋大春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50、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论文

1、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

2、陶思炎《迷信、俗信与移风易俗》《民俗研究》1993年第3期

3、程为坤《民国初年的移风易俗团体》《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4、徐永志《戊戌维新派与移风易俗》《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5、赵刚印《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变革与人的现代性》《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6、宋卫忠《维新派报刊与移风易俗》《锦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

7、尤育号《清末资产阶级的移风易俗潮》《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8、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

9、王开玺《传统服饰与近代外交》《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10、卞向阳《论晚清上海服饰时尚》东华大学学报第27卷第5期，2001年10月

11、李跃乾《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12、张荣国《服饰：一种阴喻的表述》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3、高霞玲、成小明《略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政治文化意义》《南华大学学报》第6卷第5期

报纸杂志

1、《申报》1880年—1912年

2、《大公报》1903年—1912年

3、《东方杂志》第2卷、第9卷

4、《社会世界》第2期

5、《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

6、《时报》1912年

7、《湘报》第26号

8、《神州女报》月刊第3期

9、《国民报》第297号

10、《妇女时报》第4期、第11期

译著：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美）EA罗斯的《变化中的中国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

4、（美）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5、（英）阿绮波德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

6、（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7、（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年

8、（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英文论著

1. Florence Ayscough , *Chinese Women: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York: Da Cape Press,1975

2.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后 记

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此时的心情有欣喜也有颇多感慨。回顾资料的搜集和论文的写作过程，对我这个并非科班出身的人来说确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论文是有关清末民初服饰变迁的课题，资料浩繁、零散，难以搜集，加之要照顾孩子和家人，困难更是可想而知。因此经常是白天泡在图书馆，在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杂志中一份一份地查找，力求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资料，晚上则把孩子安顿好以后，做在电脑前，整理搜集的材料，再构思，写作，反复修改。虽然辛苦，却学到了很多，这个过程也是快乐和有意义的。

当然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同学们的帮助和家人的支持。其中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导师武菁老师。武老师是一位有耐心、有责任心的老师。她对于我这个“外行”更是无微不致地关照，经常给我“开小灶”，三年中，学校的很多地方：资料室、办公室、莲池边……都留下我们的身影。可以说我的点点滴滴的进步都与武老师的细心指导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在对资料的搜集、文章的构思等方面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武老师爱岗敬业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从她身上我学到很多：做学问、做人。这种师生情意，我将铭记于心！

汤奇学老师也是我所敬仰的老师，他渊博的学识让我折服，严肃而又不乏幽默的授课令我难忘，更令我感动的是他能在百忙之中为我修改论文，并且在论文资料的补充、文章框架结构的调整等方面都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还有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陆发春老师、李修松老师、张本英老师、周乾老师、梅兴柱老师……他们教给我的知识都让我受益匪浅，也会让我终身受益。在此也表示真诚地感谢！

要感激的还有很多人，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爱护我、帮助我的师长、同学以及支持我、鼓励我的爱人、孩子！

余红

2007 年 4 月 18 日